



乾嘉经学家 文学思想研究

Research on the Literary Thoughts of the
Classicists in Middle Qing Dynasty

刘 奕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乾嘉经学家 文学思想研究

Research on the Literary Thoughts of the
Classicists in Middle Qing Dynasty

刘 奕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乾嘉经学家文学思想研究 / 刘奕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3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 - 7 - 5325 - 6094 - 3

I. ①乾… II. ①刘… III. ①文学思想—研究—中国—清代 IV. ①I20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0869 号

责任编辑: 郭时羽

校对人员: 沈美琴 等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乾嘉经学家文学思想研究

刘 奕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市裕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8 插页 2 字数 307,000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978 - 7 - 5325 - 6094 - 3

I · 2413 定价: 4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本书的出版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及上海大学211项目资助，谨此致谢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序

陈广宏

刘奕的博士学位论文出版在即,嘱我为序。鉴于文籍之序,当序作者之意,我想就谈一点对作者选题或作意的理解。

论题是关于乾嘉经学家文学思想的研究。当初我们商定这样一个研究对象,除了考虑到研究主体自身的学术兴趣与积累——刘奕本科与硕士所在的山东大学,有着深厚的文史研究传统,他较早已显露出对清代学术史的关注,还因为乾嘉经学家这一特殊的士人群体所表现的文学思想,作为决定清代中期文学及文学思想面貌诸多力量中的一个方面,长期未获应有的重视,相关研究比较薄弱。其中的原因当然很复杂,倘若从研究史上梳理起,应可看到,在很大程度上与“五四”以来的文学史家对于传统的论定有关,那确实表现出对传统文学价值观的极大颠覆。我在别的地方也曾说过,从当时的文化处境与立场出发,我们完全能够理解这样一场革命性运动的意义。不过,在进入新世纪的今天,当人们反省、总结上一个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成就与经验,探寻新的文学历史研究方法、路径或多种可能性时,也已经察觉到,这样一种以破为立目标下的文学史叙述,多少会令各历史阶段的整体文学格局及其内在构成关系,包括当时人在鉴赏趣味和批评观念方面表现出来的相当大的多样性,被简化甚或被遮蔽。因此,刘奕以乾嘉经学家文学思想研究为选题,我想其志并不在一般的拾遗补阙,而是尝试通过深入当时的历史语境,在该时代现实的文化构成关系及其相关思想学术体系中,重新考察这一类群的文学思想内涵与作用,复原它与其他文学力量及思想交汇激荡的真实面貌,藉此找到趋近文学思想历史的有效阐释。在这种视点背后,有着对既往学术方法比较自觉的省察。作者在当今重提钱大昕的“实事求是,护惜古人”,要求回到历史,目的并非全然以古人的立场、价值标准为自己的立场、标准,而恰恰是在承认不同时代、不同历

史语境有不同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标准之前提下,努力求获古今视域、立场的双向贯通。

回溯早期的中国文学史著述,比如我在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贵重书库觅得的斋藤木《中国文学史》,那是专为早大前身——东京专门学校文学科第二届学生的授课讲义,起明治二十五年(1892)十月,迄明治二十六年(1893)二月,有赖于岛村抱月的笔记,才得以留存下来,可以说是明治日本最早涌现的一批中国文学史中仅有述及清代的著述之一。该讲义“总论”部分,即将所谓中国文学分为四个时期:发明时代(周)、训诂时代(汉)、理气时代(宋)、考证时代(清),依此略述各期成就及演进大势,清代经学本身被视作一重要标志。那当然不是今人所认识的文学史标准,故与其说是文学史,不如说是学术史,反映了明治时期由末松谦澄等“东眼西视人”提出汉学革新,向以藤田丰八等“赤门文士”为代表的新汉学派的一种过渡,但这种文学观念缘何而来?又如何得以实现与欧洲浪漫主义以来的文学观念对接、转换?如果未能将清人或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梳理清楚,恐怕很难有比较全面的把握。晚清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作为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学堂的授课讲义,在当时曾有不小的影响,其框架主要依据京师大学堂文学科大学“中国文学门”所设主课“文学研究法”制订的“研究文学之要义”纲目,而该纲目主要体现的仍是代表官学的经学家的立场,重在阐发词章相对于整个经学体系的工具性意义,所有有关词章性质、体制及其作用与关系等的厘定,皆围绕于此。尽管林传甲已表现出以新学知识对之加以改造,包括对文学重新定性,其中蕴育了某种价值中立的倾向,然仍未摆脱由重实用认定文学的职能,故而亦被认为是一种“错体”的文学史。那么,这样一种存在意味着什么?“五四”以来新文学思想据以革新的动力及内在理路又究竟如何?同样需要对它们与前一个时代文学思想秩序的结构关系作较为精确的考究,才能显示其完全的意义。有鉴于此,刘奕的这个选题,即便对于清理晚清以来文学思想的变局,亦有其价值。

当然,一个更须直接面对的问题是,时至近世社会,当学术与文学早已有自然的分野,文学担当者亦已扩展到更为广大的社会力量,探讨乾嘉经学家的文学思想,对于清代中期文学及文学思想自身的演变,究竟有什么意义?作者在本书的《绪论》中,对此也有所讨论。简括言之,身为士人阶层,经学家虽然已有与文人的自我区分,但传统所要求的修养,使得他们中的许

多人仍致力于各种文体的创作;不仅如此,他们的身份自觉,反而令其有意识构建经学思想为本位的文学及批评观念,并在与其他文学力量的互动中传输并强固他们的看法。由于经学在传统社会的特殊地位,经学家的文学思想在当时及其后时代的影响力便不容小觑,由此引发与其他文学力量、思想的交汇激荡,是该时期实在的文学事相,作为不可或缺的一极,就有必要在这样的脉络中对之作更为深入的研究;而要准确把握乾嘉经学家的文学思想,则应该进入其整个学术思想体系的坐标系中予以解析。这样的认识,表明作者对上述问题已有着实的思考,并且也构成了本书撰述的内在理路,从中可以感觉到他在试图突破过去所惯习的历史观念上的努力。当考察历史演变的视点,由原来因果链构成的进化模式,转换到共时性结构中关系、位置、相互作用及转化等的呈现,一些被舍弃、忽视的现象及其意义就会得到重新发现。就清代的社会文化体制而言,鉴于经学与文学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不同层级与权力,乾嘉经学家在当时所拥有的话语权是我们不应轻视的;若考虑到他们的学术话语与皇权为主导的官方话语以及代表私领域的文艺话语之间的某种张力,那么,探究他们对于经学与文学关系的认识,包括对古代经典体制与流别探讨所反映的文学价值观及其他具体主张等,就不仅是对以前不大关注的文学批评资源的发掘,更为重要的,是该时期文学与文学思想图景,可以在上述背景下相对获得一种整合的观照。

至于具体的论著写作,其实那才是充分展示作者意图的文本所在,尤见成功。无论是以经学家与桐城派文论的对读考察两者间的挑战与回应,探讨经学家自觉选择学术文体的原因及文体特征,分析重建文笔说的过程与内蕴,围绕诸家性情、性灵说所作的种种精微的辨析,或是从诗经学的影响探察经学思想在词学理论中的贯彻等,在在显示出作者基于对古人原意的深入领悟,获得不同以往的新认识,交织着锐气与精识。不少评审专家因此给予深思冥会、新见迭出的肯定评价,这对刘奕是很大的激励。事实上,这部论著能以如今的样貌面世,倾注了众多曾经给予刘奕指导、评审与帮助的专家教授的心血;并且,正是他们的关怀与赐教,对刘奕的学术道路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在这方面,我觉得他实在是幸运的。特别令人感怀的是,我的老师章培恒先生,在身患重病期间,还坚持参加刘奕的论文答辩并赐予中肯的意见,就先生当时的身体状况而言,需要耗费何等倍蓰于寻常的体力与心力!每念及此,不禁感愧交集。而这样的示范,也就成为我自己教

学生涯中最为珍贵的财富。

既然现在这部论著即将正式出版,就不必再由我作未必切当的介绍评鉴,还是让广大读者各自径直去发现此中风景,若得会心,自是解人。也希望能因此引来更多的同道,共同推进该领域的研究。

2011 年 11 月 28 日于光华楼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序	1
绪 论	1
第一章 与文学的相互凝视	
——乾嘉经学家学术概貌	18
第一节 乾嘉经学的兴盛与发展	21
一、兴起与兴盛的原因	21
二、学派与代际	31
三、汉学弊端	36
第二节 治学方法与为学精神	40
一、治学方法	41
二、为学精神	48
第二章 文思：经学视域中的古文与骈文	56
第一节 “义法”说的反动	56
一、对义法说的态度	58
二、具体的批评	68
三、经学家的古文观	81
第二节 对学术文体的自觉	88
一、“说经之文”的提出与总结	88
二、学术史视野中的学人传记	103
第三节 道、学、文	109

一、义理、考据、词章	110
二、文对道、学的反作用：经学家的认识与实践	121
第四节 文笔说的重提与发展	133
一、清代骈文家的一般观念	134
二、文笔说：凌廷堪及汪中的重提	137
三、阮元的总结	150
第三章 诗情：新与旧的交织	163
第一节 性情诸论	163
一、经学家性情论的一般意见	163
二、溯源：朱熹的性情论与沈德潜的诗学性情论	173
三、洪亮吉：对袁枚诗论的修正与补充	180
第二节 学问与性情	191
一、学问在诗歌中存在的两个方面	193
二、学问与性情的诸种关系	207
第三节 焦循的性灵说与性情说 ——戴派义理学推展与运用的例证	212
一、性灵、性情释义	213
二、性灵文论	223
三、性情诗说	228
第四章 词意：经学、诗学与词学的视域融合	234
第一节 《诗》学：调整与贯彻 ——从清代前中期《诗经》学到张惠言词论	234
第二节 与诗离合 ——其他经学家的词学思想	249
结 语	256
参考文献	259
后 记	271

绪 论

清代是离我们最近的古代,清人是最年轻的古人。五四以来,那个被批判过赞美过抛弃过改造过的“传统”,他最后的形象定格在清帝国的幕布上。当我们试图审视、认识我们的时代与社会,无论政治制度、社会习俗,还是思想学术、文学艺术,清人的遗产都是一个最有效的参照系。

只是人事代谢,苍狗浮云,倏忽往来,顿成古今。所谓“江山犹是昔人非”的感慨,早已飘然远逝。今天中国山河日新,风景变换,起古人于地下,还识得这旧江山么?大地山河的巨变不过是一个隐喻,古今之际的鸿沟,才是这个隐喻的喻旨。鸿沟能否渡过?经过西方后现代史学的洗礼,今人对历史真相的探究,已谨慎许多。但历史到底不是不可及的汉上游女。如何回到古人的历史世界,如何理解前人的话语系统,进而把握“古今之变”,是对每一个严肃研究者的挑战。



笔者以“乾嘉经学家文学思想”为研究对象。“乾嘉经学家”,在文中所指其实就是乾嘉汉学家。乾嘉汉学,又被称作考据学、朴学。汉学之名源于尊崇、归依汉人的学术旨趣,考据是其主要治学方法,朴学则是就其学风而言,三者各有其道理,又各有不妥当的地方。朴学的提出,在汉学家那里,主要针对宋明理学而言,钱大昕(1728~1804)曾说:“宋儒说经,好为新说,弃古注如土苴,独《仪礼》为朴学,空谈义理者无从措辞。”^①

^① 钱大昕撰、吕友仁标校《潜研堂集》卷二十四《仪礼管见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388页。

因此朴学之名,隐含着反对义理之学的意思^①。似乎汉学家皆无义理兴趣,其实不然。戴震(1724~1777)固然有光彩熠熠的义理之学,私淑戴氏的后学如孙星衍(1753~1818)、凌廷堪(1757~1809)、焦循(1763~1820)、阮元(1764~1849)等人都各有义理上的创见,虽然不能与宋明儒者争高下,却自有其独特处,足以昭示其义理旨趣,所以朴学并不足以概括汉学家学术的全体。考据之学,则是颇为一些汉学家接受的说法,孙星衍甚至认为学术、著作不外乎考据,可为考据所概括^②。不过孙星衍的说法立刻遭到焦循的反对,焦氏认为考据之名太过狭隘,尚不足以概括清学^③。关于清学,余英时先生以为清学将儒学传统中“道问学”的一端发挥到极致,从而形成“近世儒学复兴中的第三个阶段”:经学家一面全面整理儒家经典,一面还原儒学中重要观念的原始意义,因此“后来的人用考据两字来概括清学,固有其理由;但这样一来,清学与宋明以来的儒学传统若邈不相接。其实若从思想史的综合观点看,清学正是在‘尊德性’与‘道问学’两派争执不决的情形下,儒学发展的必然归趋,即义理的是非取决于经典”^④。可见,清代经学的根本目的是要以经典证义理,考据学的名称也有类似朴学的不足。至于汉学,其使用频率更高,这一称呼更多是为了标明与宋明理学的对立并标榜治学的范式而采用的,所以汉宋之争,成了清代学术引人注目的现象。但是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学者求是求真,敢于裁断,并不株守汉人,汉学称呼施之于吴派也许尚可勉强,施之于其他经学家,恐怕就未足膺服人心了。所以江藩(1761~1831)《汉学师承记》甫成,龚自珍(1792~1841)就去书辩论汉学名义有十不安,应当改用经学之称^⑤。章太炎先生作为汉学殿军,也曾经指出,清人之学面貌自异于汉人之学:“大抵清世经儒,自今文而外,大体与汉

① 再如钱大昕称赞王鸣盛“后儒凿空,师心自矜。堂堂光禄,朴学是好”(《潜研堂集》卷四十八《西沚先生墓志铭》,841页),称赞惠栋“汉儒说经重训诂,授受专门先后印。……后人凿空夸心得,一笔欲将郑服摈。虚谈名理诃玩物,陈义甚高词已遁。……青紫拾芥何足云?朴学千秋宜自奋”(《潜研堂诗集》卷十《题惠松崖征君授经图》,1122页)。洪亮吉也说:“盖自元明以来,儒者务为空疏无益之学,六书训诂,屏斥不谈,于是儒术日晦,而游谈空兴。……迨我国家之兴,而朴学始辈出。”(《卷施阁文甲集》卷九《邵学士家传》,洪亮吉撰、刘德权点校《洪亮吉集》,中华书局,2001年,192页)都是以理学、朴学相对而言的。

② 见孙星衍《问字堂集》卷四《答袁简斋前辈书》。骈宇騄点校《问字堂集·岱南阁集》,中华书局,1996年,90~92页。

③ 见焦循《雕菰集》卷十三《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续修四库全书》第148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④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三联书店,2000年,310页。

⑤ 龚自珍《与江子屏笺》云:“大著读竟,其曰‘国朝汉学师承记’,名目有十不安焉。改为‘国朝经学师承记’,敢贡其说。夫读书者,实事求是,千古同之。此虽汉人语,非汉(转下页)

儒绝异。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短长虽异,要之皆征其文明。”^①可见汉学也并非清人、近人最认同的称名。

在清代,最为学界广泛接受而无疑义的称呼就是经学了。在汉学家看来,宋明人对义理的讨论大多出于胸臆,完全背离了六经,“自唐之中叶以迄于有明,著书解经者,汨经之旨,乱经之诂训,十而九焉”^②。更有甚者,颇有狂狷之气的凌廷堪干脆不承认宋明理学在经学体系中的地位,高举“宋儒之理义乃禅学”的大棒打将下来,得出了“其于圣学何啻风马牛乎”的结论^③。皮锡瑞(1850~1908)在《经学历史》中还算客气,把宋代视作“经学变古时代”,至于元明,则是“经学积衰时代”。而“经学自两汉后,越千余年,至国朝而复盛”^④,也就是说,真正配得上经师荣耀的,还是清人。自以为在经学上能够上承两汉,甚至超迈两汉,这是清代学者的自信与自负,故而对经学名义居之无疑。

上古三代无疑是汉学家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六经则是关于黄金时代的法典,古人的理性与智慧借由六经将后世照耀。乾嘉经师认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准则和道德被六经所保存,而完美的社会形态和生活方法也可以通过六经的正确解读而开启。段玉裁(1735~1815)曾多次表达了这一想法:

六经犹日月星辰也,无日月星辰则无寒暑昏明,无六经则无人道。为传注以阐明六经,犹羲、和测日月星辰,敬授民时也。^⑤

尝闻六经者,圣人之道无尽藏。凡古礼乐、制度、名物之昭著,义

(接上页)人所能专。一不安也。本朝自有学,非汉学。又汉人稍开门径,而近加邃密者,有汉人未开之门径。谓之汉学,不甚甘心。不安二也。琐碎短钉,不可谓非学也,不得为汉学。三也。汉人与汉人不同,家各一经,经各一师,孰为汉学乎?四也。若以为汉与宋对峙,尤非大方之言。汉人何尝不谈性道?五也。宋人何尝不谈名物诂训?不足概服宋儒之心。六也。近有一类人,以名物诂训为尽圣人之道,经师收之,人师摈之,不忍深论。以诬汉人,汉人不受。七也。汉人有一种风气,与经师无异,而附于经,谬以神灶梓慎之言为经,因以陈五行,矫诬上帝为说经,大《易》、《洪范》,身无完肤,虽刘向亦不免,以及东京内学。本朝何尝有此恶习?本朝人又不受矣。八也。本朝别有绝特之士,涵泳白文,创获于经,非汉非宋,亦惟其是而已矣。方且为门户之见者所摈。九也。国初之学,与乾隆初年以来之学不同。国初人即不专立汉学门户,大旨欠区别。十也。有此十者,改其名目,则浑浑噩噩无一切语弊矣。”《龚定庵全集类编》卷七,中国书店,1991年,211~212页。

① 章太炎著,徐复注《馥书详注·清儒》,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61页。

② 王鸣盛《西庄始存稿》卷二十四《赠翁征士霁堂先生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434册。

③ 凌廷堪撰,王文锦点校《校礼堂文集》卷十六《好恶说下》,中华书局,1998年,142~144页。

④ 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214页。

⑤ 段玉裁《经韵楼集》卷一《十三经注疏释文校勘记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434册。

理、性命之精微，求之六经，无不可得。虽至亿载万年，而学士大夫推闡，容有不能尽。无他，经之所蕴深也。^①

经学家开启智慧的密藏，宣示神妙的法则，这是何等的荣耀。庄严伟大如斯，相形之下，为学于经学之外，便不免自郅而下了^②。

在乾嘉学者看来，经学研究当以疏证经义为主要研究内容。戴震曾就此指示学者，经学研究包括了天文历算、礼乐制度、典章名物，以及音韵训诂等众多研究领域^③。此外，还应当以诸子百家之学作为辅助。焦循在反考古据之称时对经学名义有一段很好的概括与发挥，兹摘录于下：

循谓仲尼之门，见诸行事者，曰德行、曰言语、曰政事，见诸著述者，曰文学。自周秦以至于汉，均谓之学，或谓之经学。汉时各传其经，即各名其学……无所谓考据也。……经学者以经文为主，以百家子史、天文、术数、阴阳、五行、六书、七音等为之辅，汇而通之，析而辨之，求其训诂，核其制度，明其道义，得圣贤立言之指，以正立身经世之法。以己之性灵，合诸古圣之性灵，并贯通于千百著书立言之性灵，以精汲精，非天下之至精，孰克以与此？……本朝经学盛兴，在前如顾亭林、万充宗、胡朏明、阎潜丘，近世以来在吴有惠氏之学，在徽有江氏之学、戴氏之学。精之又精，则程易畴名于歙，段若膺名于金坛，王怀祖父子名于高邮，钱竹汀叔侄名于嘉定。其自名一学，著书授受者，不下数十家，均异乎补苴掇拾者之所为，是直当以经学名之，乌得以不典之称之所谓考据者混目于其间乎？^④

可见，经学之名具有极大的概括性，焦循认为经学研究“以经文为主”，而兼及“百家子史”等内容，且由训诂而制度，而道义，即同时包举考据与义理，不但是儒家学术的总称，甚至可以指称整个传统学术。因此当我们进入对这些学者文学思想的分析时就会发现，与文学相互影响的学术，并非只限于考

① 段玉裁《经韵楼集》卷六《江氏音学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435册。

② 如王鸣盛说：“学之之难言也，岂不以其途之多所歧乎哉？有空谈妙悟而徒遁于玄寂者矣，有泛滥杂博尔不关于典要者矣，有溺意词章春华烂然而离其本实者矣，有揣摩绳尺苟合流俗而中踴精意者矣，此皆不足务也，是故经学为急。”王鸣盛《西庄始存稿》卷二十四《赠任幼植序》。

③ 见戴震撰、汤志钧校点《戴震集》文集卷九《与是仲明论学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82～184页。

④ 焦循《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

据一途,也包括戴震及其后学的新义理学。显然,采用最具包容性的经学家的称呼更为合宜。同时,经学家既然是这些学者最乐意自居的称呼,那么不妨尊重古人的选择。需要稍加说明的是,因为“汉学家”也是个流传久远、约定俗成的称呼,论文中行文之时也会常常使用这一惯用称呼,它在文中的指称与经学家是相同的。

至于“乾嘉”的时间限定,并非严格对应为乾隆、嘉庆朝,它更多是在对清学的巅峰作一时段上的描述。乾嘉汉学真正的勃兴始于惠栋、戴震,至嘉庆时为极盛,至道光则逐渐衰落,这是古今皆无异议的结论。因此,这里的时间段即是乾嘉汉学从勃兴到衰颓的时期。

那么哪些学者应该得到清代中期经学家的荣耀呢?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已经为我们确定研究对象提供了一份名单,但显然因为时代稍早而不是一份完备的名单。更为详尽、也比较可信的名单,我们可以从《书目答问》和《清史列传》中获得。《书目答问》是研究清代文学、学术的入门钥匙,其书除了在集部目录中专列有“国朝考订家集”可供参考外,更在书后附录了一份详尽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其中的经学家目又分“汉学专门经学家”和“汉宋兼采经学家”两小目,而后者所收基本上属于清代前期学者,因此前者正是我们需要的名录^①。《清史列传·儒林传》共四卷,《传上》两卷收理学中人,卷六十八、六十九两卷是《儒林传下》,收经学家,与《书目答问》提供的名录有相当大的重合面。两种目录代表了当时与稍后学界的一般看法,而且收录人数较多,著名学者大都已入选,避免了因门户之见和个人偏好而造成的遗漏。合《汉学师承记》、《书目答问》、《清史列传》三书,我们一共得到一份有清 260 年 413 位经学家的庞大名单,其中属于清代中期的学者大约在 260 人左右,足觐一时学术之盛。在这两百多人中,我们还可参考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等书中的相关评述决定去取。

对学术显然自有谱系,如浙东史学、今文经学和过于偏重宋学的学者,只能暂不加以讨论,以避免不必要的杂乱。虽然这种多声部交织的杂合也许更接近历史的本来面貌,但却会大大超出本书所能控制的范围,只能遗憾地把工作留待今后了。此外,虽然这些学者都有或多或少的文学创作,但或者因为文集无存,或者因为所存文字中缺少对文学的特别关注,或者因为文学思想太过庸常而未被论及,本文实际论述到的学者大概有四十多位。他们的名单在参考文献中自可见到,故不再冗列。

① 《书目答问》和《清史稿·儒林传》都经手于缪荃孙,很显然具有相当的同质性。而且《清史稿·儒林传》去取过苛,名录较小。因此我们采用前一书。

葛兆光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中关于思想史的论述,很有启发性。除了精英的创见,大众的信仰、知识界的普遍看法也应该成为思想史的关照对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研究者对思想之“史”的发现。研究的立足点不能只是“思想”这一点,而应该同时站在“思想”与“思想的历史”两个基点之上。因为杰出的思想也很难脱离时代,依然根植于前代和同时的大众思潮。离开了对后者的把握,未必能真正理解前者。所以葛先生强调“思想史的连续性”,视角的转换、方法的拓展,使得对历史更深、更真切的切入成为可能^①。因此,我选择“文学思想”,而不是“文学理论”或者“文学批评”,作为本论文的题目,正是希望在新颖、独创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以外,也关注到士人群体一般的文学思想,试图更全面地描述清代中期文学思想的整体面貌和演进态势。“文学思想”,罗宗强先生在《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认为应该包括“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的倾向”^②,这当然是很好的意见。具体到本书,我们认为研究清代经学家的文学思想,还应该包括他们对经学、文学关系的认识和处理,包括他们在经学研究中古代经典的体制、声韵格律及修辞惯例等的见解与探讨,也包括他们对学术文字的文体、风格等的自觉选择所透露出的文体观、文学观。而这些,都是借由学术、知识和技术操作所能透视到的思想观念。

学者不同于文人,对他们文学思想的关注也许会受到质疑,可一旦深入到历史之中,就会发现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如同魏晋玄学、唐代佛学、宋明理学一样,汉学经学是有清一代之学术。毫无疑问,时代之学术总会对自身及后来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思想产生深刻而久远的影响,清代自然也不例外。学者们也已论述及此,除了各种文学批评史、理论史中的有关章节,陈居渊先生《清代朴学与中国文学》大概是第一部专门论述清代学术与文学关系的著作。稍后有马积高先生的《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其中多博通明达之论。而马睿先生《从经学到美学:中国近代文论知识话语的嬗变》、刘再华先生《近代经学与文学》都是讨论近代经学、文学关系的著作,因为今文经学的复兴,此时的学术、文学面目与清代中期颇有异同,而承续之迹俨然^③。杨旭辉先生的《清代经学与文学》,则以清代常州府城和武进、阳湖两县的学

① 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卷一《导论:思想史的写法》。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② 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引论》,中华书局,2003年,1页。

③ 在近代学术、思想界有大影响的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等学者都是二书重点论述的对象。章、刘都承续了江南汉学一脉正宗,自不必说;康、梁学术除了接受今文经学外,他们所承继的广东学术的统脉,则是由汉学大师阮元所开启。此等处尤可见对乾嘉学术、文学做深入研究的重要性。